

国际维度下的中国市场经济演进评议

孙景宇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文章认为当前市场经济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维度评价。由于现实世界中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就越来越表现为国际维度下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从当前世界经济秩序来看,市场经济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造就了有等级的产业分工,而市场经济的这种等级化特征正是区分一国市场竞争力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进行了简要评议。

关键词:国际维度;竞争力;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10-0108-08

施莱佛和托瑞斯曼(Shleifer and Treisman)在 2005 年发表论文指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①。继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相继得到认同之后,2004 年,国内外对中国是否已经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透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学术界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相同,这为我们衡量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带来了一定的混乱。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判断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由于现实世界中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制度变迁就不仅仅是一个自发的演化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向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相对于钱颖一教授强调法治建设的作用,我们更看重从国际维度来评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法治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国内维度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演进过程中,在国际维度下,中国只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才能逐步摆脱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避免被边缘化。

收稿日期:2005-07-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JL005)

作者简介:孙景宇(1977—),男,吉林四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当前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局限性

前苏联、东欧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使我们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在不断深化。最初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满足需求的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以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市场经济就是一套由生产函数决定的物质系统，它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各个分散的决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按照这种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放开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扭曲的价格，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就能够更有效地对不同稀缺商品进行调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案在实践中都为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使人们意识到，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在供给与需求背后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被揭示出来。钱颖一认为，这一分析框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研究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的机制。供给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然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但却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二是即使在研究资源配置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原因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①。这使得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又形成了两条路线：（1）针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这些市场失效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将博弈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理论引入了新古典理论^②。（2）针对供给需求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钱颖一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地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生产和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③。

这两条路线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通过价格实现资源配置，还应该有良好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深入到制度层次，而制度构建也成为原计划经济国家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们将制度构建问题进一步深化，认为制度构建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法治。钱颖一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只关注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联，却尚未充分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联系。毋庸置疑，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法治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但是它是不会“自我维持”（self-sustained）的^④。在此基础上，钱颖一将法治的发展水平作为评估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他认为“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而法治对以上两者都有限制作用，因而只有建

设法治才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⑥。

在制度层面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使人们对诺思宣称的“制度是重要的”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这使得经济学家们逐步达成共识,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内生的自我演化过程,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进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形成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越来越倾向于论证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结果的多样性,强调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因而其理论的综合能力越来越差无法对不同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演进的总体趋势做出判断,也没有指出他们会在哪些方面趋同。如果制度变迁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话,那么路径依赖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供求曲线背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必须注重法治的形成,以建立起支持市场的制度环境。但如果制度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演进过程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明外在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制约,以整体的视角全面考虑每个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这使得世界经济往来不断增多,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封闭的经济实体由于不能分享产业分工和信息交流的好处而难以取得快速发展。因此,伴随着产业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新整合,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国内维度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发的制度变迁过程,而是通过国际间的竞争表现为国际维度下的互动过程。可见,当前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封闭性,由于只注重国内维度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而忽视国际维度下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因而有悖于现实世界中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二、从国际维度理解市场经济的演进

经济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从来就是开放的经济。在欧洲,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始于 15 世纪下半叶,它是与大范围的航海探险运动相联系的。波拉尼指出,正是由于原本与国内经济结构分离的国际贸易促进了财富的大量积累和集中,以致对这些财富的使用成为正在诞生中的民族国家的主要筹码,商贾与君主利益的结合使国内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个经济世界是通过突破并深入洲际空间,由外向内即由国际贸易向国内贸易运动来发展自己的。到 17 世纪,是西欧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将各个局部市场与对外贸易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体化和竞争性的国内市场^⑦。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在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演进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19 世纪期间,在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开始向欧洲大陆甚至向非洲传播,工业生产规模随着欧洲经济向世界扩张而扩展,欧洲经济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在金本位制度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经历

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际贸易、金融以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空前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增速超过了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增速,除了商品贸易快速发展外,服务贸易(银行、信息等)也大大增加,在金融领域出现了一场改变世界发展的金融革命,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放松金融管制、创造新的金融工具(例如金融衍生产品),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金融制度的整合,这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演进从来就是不平衡的。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不平等,处处体现了霸权国家的利益。从国际间的产业分工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完善,其国内的企业主要处于产业分工的上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前期投资巨大,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产品技术开发所需要的雄厚实力,因而只能引进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产品,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对产品的流程进行优化组合以降低成本,因而其国内企业往往是紧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后面,处于产业分工的下游。这些企业的产品由于技术成熟,替代品较多,因而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低。可见,在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而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其产业调整引导并制约着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际经济的等级性特征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沙奈指出,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并没有取消各国的金融体系,他们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体化并形成整体,这个整体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所决定的;其次,这个整体的各个监管和监督机构是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再次,各个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的统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据各市场不同程度的差别进行交易来实现的^⑧。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通过竞争连在了一起,而市场经济演进的不平衡使得优胜劣汰机制必然在他们之间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则就在于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其结果是处在经济世界中心的国家能够按照自身最终消费或中间消费的需要,迫使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其控制的地区进行生产重组,这样,处于外围的国家其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本地的需要,而是与世界市场挂钩,同时决定中心与外围之间交换比例的也是力量的对比而不是假想的供求之间的冲突^⑨。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造就了有等级的劳动分工以及生产者之间的财富分配,通过竞争,市场力量促使国内和国际社会重新安排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中心和一个依附的外围,这样的国际分工就决定了在这个全球体

系内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因为外围地区的剥削率远远超过中心地区的剥削率,而且外围地区的经济盈余会被转移,以便满足中心地区的需要。^⑩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等级化特征就成为评估市场经济发展演进的标准。在国际维度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处在经济世界中心位置的国家把持着产业链分工的上游,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些国家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就比较好,可以称之为好的市场经济;而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的国家,由于在经济世界中被“边缘化”,因而其竞争力就比较差,在这些国家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就比较差,可以将其相应地称之为坏的市场经济。

三、对中国市场经济演进的简要评议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是被排除在全球产业分工之外的,因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最初并没有受到国际化的压力,只是表现为国内维度下的以自发演进为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体制改革开始于1978年12月,由于此时改革的重点放在计划经济影响较弱的农村,而计划经济影响较大的城市只是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是在“体制外”进行的。直到1984年10月,前一阶段改革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又促使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原来在体制外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开始向体制内渗透,“计划—市场”双轨制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到了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全面提速,在微观领域,企业市场化深入到“制度创新”层次;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财政、金融、外汇等领域的制度构建全面展开;在宏观调控领域,政府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

然而正像前文一再强调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不可能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迫使中国一步步从封闭走向开放,招商引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样,原来国内维度下的以自发演进为主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日益受到世界经济秩序的制约以及相关国家的影响,开始演变为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过程。1997年中国“过剩经济”的出现,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在结构上表现为由生产主导型向流通主导型转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表现为从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孙景宇(2004)认为,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⑪。另外,在国际经济领域,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 36.7%，是印度、巴西、美国和日本的两倍多，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融入到了全球产业分工之中，在全球的产业分工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这之后，对外经济的联动效应逐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优胜劣汰机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得不改变原来以自发演进为主的制度变迁方式，而转向关注国际维度下的制度变迁方式。2001 年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的认可，中国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已向信息社会迈进，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地占据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上游，他们生产的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因而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这说明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着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的缺陷，因而还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在金融和技术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可见，世界经济演进的不平衡性对中国市场经济在国际维度下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陈佳贵、黄群慧(2005)构造了一个新的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经济国情分类框架。应用这个框架，他们认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为工业经济大国，但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高^④。这样看来，对于国际维度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必须推进产业现代化，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组织管理规范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建设，从而抢占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上游，避免被边缘化。

四、结 论

如果制度变迁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话，那么供求曲线背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制度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演进过程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明外在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即注意国际产业分工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体制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是通过竞争联结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整体。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中各具特色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发展不是平等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则是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它在造就中心国家发达的同时，也使得外围国家在技术和金融方面依附于中心国家。因此，与钱颖一将法治的发展水平视作评估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由一国在全球产业分工链上的位置所决定的其竞争力的强弱才是更合理的评估标准，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其竞争力较弱，在

国际竞争中容易被“边缘化”。在国际维度下,中国只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才能逐步摆脱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从而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 本文为景维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过程的阶段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A normal country: Russia after commu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 151~174.
- ②④参见钱颖一:《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第7~12页。
- ③开创不完全信息理论的斯蒂格利茨是其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传统问题,需要解决的更广泛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在决策前,决策者如何知道需要什么信息和如何获取这些信息?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决策者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何协调?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⑤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钱颖一深入地探讨了市场、政府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起到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为制度保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是可持续的,因而法治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造就有限(limited)政府和有效(effective)政府的制度基础。参见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第1~11页;钱颖一:《政府与法治》,《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 ⑥参见钱颖一:《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年12月13日。
- ⑦参见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 ⑧⑨参见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60页。
- ⑩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与新的全球化》,载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 ⑪参见孙景宇:《完全市场经济还有多远——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研究》,《改革》2004年第6期,第16~22页。
- ⑫参见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4~16页。

参考文献:

[1] Frederic L Pryor. Market economic system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2005, 33: 25~46.
- [2] Djankov Simeon, Glaeser Edward, La Porta Rafael, et al.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 595~619.
- [3]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 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5] 王正毅, 张岩贵.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 景维民. 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景维民, 孙景宇. 全球视角中的转轨经济[J]. 经济学动态, 2004, (3): 88~91.
- [8] 孙景宇. 经济转型进程测度——比较与研究方向[J]. 经济科学. 2004, (5): 5~13.
- [9] 冯舜华. 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关系——俄罗斯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7): 60~65.
- [10] 郭连成.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 (12): 30~35.
- [11] 雅诺什·科尔奈. 大转型[M]. 比较(第17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1~24.

The Evaluation of China' Market Economy: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SUN Jing-y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limitation of current studies on the market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is that it has ignore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cause there ar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regime arrangements, institution change is no longer a spontaneous evolutionary process, but an interactive proces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term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core rule of market economy i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at leads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i. e., a ranking system. The ranking system becomes the criterion to judge a nation's competitive power.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evaluation of China' market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market economy;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责任编辑 金 澜)